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Collection – Colle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Legacy in Great Britain

知性的收藏勢力－中國文物收藏在英國



大衛德基金會的
明代官盞收藏豐富，此為宣德青
花釉裡紅海水龍
紋高足盞

英國的「中國熱」

英國對中國文物的狂熱，最早可以溯源到十六世紀，當時經由海上國際貿易所引燃的「中國熱」瀰漫整個歐洲，擁有中國文物，尤其是瓷器，已經是一種身份與地位的象徵。很顯然地，同西方其他國家的收藏家一般，英國的收藏家是從收藏中國瓷器開始。譬如最早在一五九九年之際，英國的湯瑪士·皮列特(Thomas Platter)就曾提到，倫敦的商人科普(Cope)就已經收藏了一系列來自中國的陶壺和瓷器¹。一六一二年以後，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建立，英國開始自中國運回一批批精美的瓷器，同時也帶回各式各樣的中國文物，像是字畫、漆器、織物等等，逐漸引發了對中國文物的收藏與研究的熱潮，因此歷代收藏家輩出，由於字數限制，本文只選擇數位代表性的收藏家做精簡介紹。

或許最早的收藏動機是以炫耀或追求時尚為主，但是卻有愈來愈多的英國收藏家，以研究為目的，由於他們深入的研究，使得他們的品味、眼光，非同凡俗，能夠早一步系統化地收藏中國文物的精華。一般而言，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期，部份英國收藏家是以研究奇風異俗的態度收藏中國文物，漢斯·斯洛恩(Hans Sloane, 1660-1753)即是一位代表性的收藏家，他最早曾捐贈

曾 肅良 Su-liang TSENG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候選人

一批藏品給大英博物館，這一批經過分類的藏品中，就包括算盤、筷子、絲綢、錢包、三寸金蓮、神像雕刻以及陶瓷裝飾等等，這些藏品代表英國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研究的開始。

以知識為後盾的系統化收藏

十八世紀中期，對於中國物質文化的研究進入有了更深一層的研究，法蘭克(A. W. Frank)在他服務大英博物館期間，為大英博物館建立了一批精美的藏品，其中包括一批在一六四四至一七二二年間，產自福建德化窯的白瓷印章。

如同其他西方收藏家一般，早期的英國收藏只能算是精緻的舶來品，大部份是大量製作給洋人的紀念品，甚至是贗品。一直要到一八五〇年以後，由於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與鴉片戰爭(1856-1860)，許多掠奪自中國宮廷的精美寶藏，才得以流到西方。利用在歐洲與英國的幾次拍賣會，以及購自參與掠奪的士兵手上，法蘭克一舉豐富了他的收藏。一八七六年，他個人收藏的中國陶瓷公開展覽於倫敦的貝斯納·格林博物館(The Bethnal Green Museum)，他親自撰寫論文以及編排有關款識和符號的附錄，並交由南肯辛頓博物館(The South Kensington Museum)的科學與藝術部門出版。



大衛德基金會的清官盞收藏

在法蘭克的收藏過程中，由於他並不懂中文，所以他委請博物館的同事，東方古文物部的山米爾·波許博士(Dr. Samuel Birch, 1813-1885)，中國文物收藏品負責人兼倫敦大學中文教授的羅伯·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 1838-1913)，幫助他翻譯內文與款識等工作，由於法國人對漢學的研究，要早於英國，所以在法蘭克的收藏筆記中，許多中國古陶瓷的專有名詞譯自法文，許多仍然沿用至今。

為了擴大其收藏管道，他也委託業餘的漢學家與陶瓷收藏家史帝芬·伍登博士(Dr. Stephen Wooden, 1844-1908)，當時擔任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醫官，協助他在中國本土蒐集古文物，不過他所買進的部份文物的真偽性，卻一直引起許多爭議，至今，論者一般都以為，他是被當時北京的古董商所欺騙(Harrison-Hall, 1997:224)。雖然如此，仍然無損法蘭克超過三千件收藏品的可看性，他以宏觀的角度，所逐步收集各個窯址的代表性作品，在當時許多專家與收藏家，仍然只專注在景德鎮窯，而對其他瓷窯所生產的作品，尚知半解之際，顯然法蘭克有著獨到的眼光與寬廣的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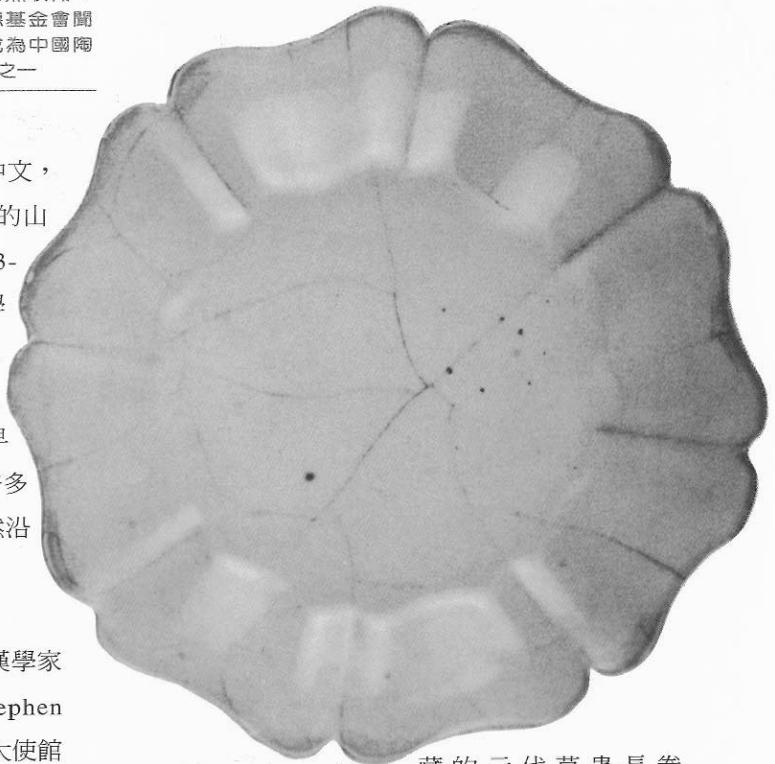
嚮往豐厚文化內涵的書畫藝術

至於在字畫方面，由於書畫所蘊涵的文化獨特性與深廣度，遠遠超過歐洲人以裝飾與技術觀念下所認識的中國器物文化，所以在十八世紀末以前，中國書畫在歐洲仍然鮮有流通，而且由於認識不足，收藏並不若古器物精彩，筆者見到的許多英國收藏品資料中，就發現許多的贗品，其中就以字畫最為常見，錯誤甚至發生在以收藏中國文物的博物館。

目前知道最早書畫收藏是巴特勒(W. Butler, 1748-1822)在一七九七年所收



大衛德基金會的清官瓷收藏



藏的元代草蟲長卷(Whitefield, 1993)，另外他也收藏有一本以魚為主題的水墨冊頁(Whitefield, 1995:207-208)。一直到一八八〇年，才有旅居日本十七年的威廉·安德森博士(Dr. William Anderson)，將約有兩百件的中國繪畫帶回英國，當時西方並未對書畫有深入的認識，因此威廉·安德森曾在他的收藏目錄序文中，形容中國的繪畫為「往往給人一種錯誤的陰鬱印象，卻是潛藏著最深厚的文化基礎的珍品」(Binyon, 1927:10)，他對中國繪畫的認識雖然有限，但是他對中國書畫的見地，卻令人佩服。這批作品，連同他所蒐集的日本繪畫作品，都在一八八一年為大英博物館所購藏(Binyon, 1927:10)。

尋寶探險帶動收藏熱

隨著歐洲諸國的海外勢力的擴張與以學術為後盾的尋寶探險，逐步加溫的中國熱，在二十世紀達到了高潮，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的中亞探險隊來到敦煌，取走了二十四箱經卷和五箱的絹畫、刺繡等藝術品，一九一四年，他再度從敦煌取走了五百七十部漢文經卷，這些寶藏，包括目前全世界現存最早的唐懿宗咸通年間

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斯坦因自敦煌所帶回英國的金剛經活字印刷本（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的活字印本金剛經，全部運歸英國本土存放於大英博物館裡。

一九〇二年，斯坦因在德國漢堡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上，報告了發掘和闡的經過，各會員國決定成立國際中亞及遠東探險協會總會，不但形成了另一波中國西北的考古熱潮，也吸引了舉世的收藏界對中國文物的關注。緊接著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外國人所參與的中國鐵路建設中，更出土了大量的地下墓葬品，像是唐三彩等高古文物，種種機緣，都造就了西方新一波的文物收藏風潮。

活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收藏家，由於知識與經驗的累積，普遍已經以較寬廣的視野，從事中國文物的收藏，書畫、銅器、金銀器、玉器與陶瓷等等收藏與研究，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展，這股收藏熱潮成就了在一九三五年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的「國際中國藝術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共展出3078件精品，根據統計，約有五十萬人參觀此項展覽(Draak, 1985:16)。

一九一三年，大英博物館繪畫部門的助理保管人(Assistant Keeper)勞倫斯·比昂(Laurence Binyon)，為博物館從私人手中購進了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基於他對顧愷之的研究，在一九三〇年，又為博物館購進一幅顧愷之風格的大幅的卷軸畫「洛水女神」。

東方陶瓈學會與大衛德基金會

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東方陶瓈學會(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的成立，更標誌著對中國陶瓈研究的進展，匯聚了當時傑出的學者與收藏家流，形成一股龐大的研究與收藏勢力。其中就以裴西瓦·大衛(Percival David, 1892-1967)最具代表性，一九三二年，他提供資金支持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藝術講座，並親自翻譯明代曹昭所寫的「格古要論」，他之所以推崇此書，是因為他對中國文物的收藏觀念，大多得利於此書的啟發，此譯本在他死後的一九七一年由費伯出版社(Faber & Faber)出版(David, 1971: 7)。

一九五二年，他設立如今已經成為研究中國陶瓈者嚮往的博物館之一的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除了展示他傲人的收藏之外，其中也設立圖書館，鼓勵研究中國藝術，圖書館收藏了各種中國歷史文物、字畫目錄與善本書籍等，他曾意圖將基金會變成中國藝術的綜合研究中心，因此他也對書畫濃厚的興趣也相當濃厚，現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唐代畫馬名家韓幹的「照夜白」，就曾經是屬於他名下的收藏。



斯坦因所帶回英國的敦煌經卷圖像（目前收藏於大英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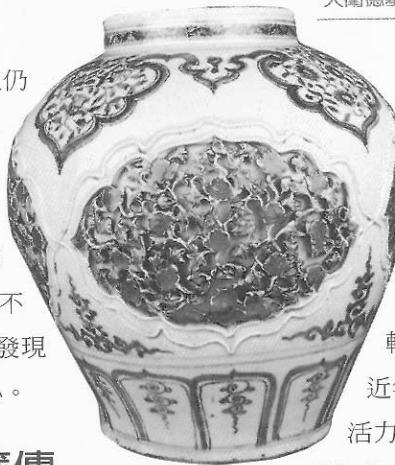
但是綜觀他的收藏生涯，基本上仍然是以中國陶瓷為重點，而且主要放在宋以後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宋瓷，由於他研究之精深與眼光之卓越，使得他能擁有一流的收藏才華，收藏品質不僅精美，而且完整，觀者可以發現他將中國古陶瓷系統化的企圖心。

知性與共享的收藏傳統

從近四百年英國收藏家收藏中國文物的過程來看，在令人豔羨的精美藏品之下，卻是一頁頁算路藍縷的滄桑史，從懵懂無知到目前收藏豐富、專家輩出與專書充棟的境地，可是歷經多少經驗的積累與知識的傳承，今天的成就絕非朝夕之功，研讀英國收藏家的生平，可以發現，優良的收藏傳統與非功利的態度，使得大多數的英國藏家，非以投資為目的，而純以審美與知識為起點，融合學術性的研究，以理路清晰的人文與科技史觀，來擴展其收藏架構，而使得他們的收藏脈絡分明，環環相扣。

由於對知識與專業的尊重，使得他們能與學者與藝術家之流，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有很多收藏家甚至著書立說，獎勵進一步的研究，然而最重要者，是他們有著「不藏私」的傳統，願意將畢生積蓄捐贈博物館，藏品可免於身後流散的命運，更可以使一代代的知識繼續傳承下去，知識唯有共享，才可以使文化不斷推陳出新，匯聚出不斷前進的巨大力量，英國的哲學家笛卡兒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在此地收藏家吸收異文化的實踐裡，顯然得到明證。

博物館與圖書館是人類知識傳承的媒介，而博物館與圖書館的多寡與運作的優劣，正標誌著國力的強大，然而博物館的建立，除了有賴政治家的高瞻遠見，更需要收藏家、學者的推動，與整體社會大眾的支持。揆諸先進國家的博物館建設的歷史，是建立在與收藏家的互動上，第一流的博物館，必然需要第一流的收藏家，而且非數十年以上的積累，難有可觀。



如今，台灣已經邁向文化社會，文化的需求使得博物館的建設刻不容緩，藏品的質量更待提昇，然而博物館的收藏力量，不能單靠政府有限的預算與推動能力，唯有結合民間收藏家的力量，群策群力，相輔相成，才能早日成就一定的規模。

近年來，收藏風尚風行，台灣收藏家的活力熾盛，然而他們是否能夠在往後台灣博物館與文化的建設大業中，扮演推手的角色，似乎端視收藏家是否能夠具備「不藏私」的恢弘胸襟，力行「知性收藏」與「知識共享」的收藏觀念。■

註釋

1 Honour, Hugh (1961), *Chinoiserie*, p: 42, London: John Murray Ltd.

參考書目

Binyon Laurence (1927), *Chinese Paintings in English Collections*, Paris and Brussels: G. Vanoest.

David, P.(1971), *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 London: Faber & Faber.

Draak, Maartje(1985), ‘Chronicle of th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 , in Scheurleer, P. L.(ed,1985), *Asiatic Art in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Amsterdam: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 and Meulenhoff/ Landshoff Amsterdam.

Harrison-Hall, Jessica(1997), *Oriental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Caygill, M. and Cherry, J.(eds, 1997), A.W. Franks, *Nineteenth-Century Collecting and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for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Whitfield, Roderick (1995), *Landmarks in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Art in Great Brita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Whitfield, Roderick (1993), *The Fascination of Nature: Plants and Insects in Chinese Painting and Ceramics of the Yuan Dynasty*, Seoul: Yekyong sanopsa.

唐代韓幹的「照夜白」，曾為裴西瓦·大衛的收藏品，後轉讓給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